

■ 学人素描

刘纪鹏：不是“经济学家”但绝对是专家



刘纪鹏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改革中，他是中国股份制改革及股市建设的众多拓荒者之一。他自称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绝对是专家。他主持了像玉林柴油机总厂等近300家各类企业的股改、上市及管理咨询方案设计。他也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中很多次的言论之争，但他一直坚持资本市场的渐进改革思路，主张要将中国国情与国际规范有机结合，寻找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捷径。

◎ 卢晓平 倪小林

做中国资本市场的探路者很自豪！这是我们采访结束以后对刘纪鹏教授最为强烈的印象，和他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很坦率，也很自足。不是因为他在拥有的那些名誉和地位以及其他，而是在过去30年里，他有幸在中国股份制改革及在股市建设上，是众多拓荒者中的一员。

在采访过程中，他递给我们一份参考资料，那是1996年他的署名文章《法人的困惑与思考》，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需把中国国情和国际规范有机结合，我们需要的借鉴国际规范为中国国情所用，最终找到一条能够快速平滑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和成熟资本市场的捷径。”

中国的改革一定要切合实际，运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同样要结合实际。刘纪鹏对此的结论，依然来自亲身参与改革过程的实践。

我信奉“猫论”和“摸论”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采访刘纪鹏很自然就从这一话题开始。谈到改革，刘纪鹏很激动。

他曾经是我国著名经济学教授蒋一苇先生的学生，他说自己受到蒋一苇教授在研究思路和方法及研究范围的影响都相当大。这当然与他在首都经贸大学学习工业经济有直接关系，研究企业是专业带给他的乐趣。当时，蒋一苇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企业本位论》激起了刘纪鹏希望更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的愿望，最终报考了蒋一苇教授的研究生，从此和中国资本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资本市场这样的字眼是很忌讳的，股份制在当时也是极为敏感的话题。改革初期，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选择的改制样本，基本上是那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是很大的企业，大多都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由此，他和导师的第一个股改方案是为重庆嘉陵厂一家集体企业做的。刘纪鹏认为“当时我们不可能把这些集体企业的产权按照职工、企业家这样去划分，时机不成熟，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所以

我就一步一步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设计中国企业股改的模式。”尽管后来有不少大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源配置，进入世界五百强之列，按国情寻找出路至今还是没有改变。

这也是刘纪鹏对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投以极大关注的原因，没有创新没有民间改革动力，何来今天的经济大好局面？邓小平的“猫论”正是解放思想的最通俗也是最为经典的阐述。说起他参与很早以前的STAQ交易系统建立过程；为了海尔的股改方案，带领到企业奋战的情景；讲到李宁公司与健力宝的分拆和组建股份公司；作为大陆企业到港上市的专家组成员，推动H股上市等等如数家珍。最后说“我最看重的是改革的方法论和方法论的改革。当我们确定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之后，怎么才能在稳定和发展的双重要求中找到正确的路径，来实现这个方向才是最关键的？小平同志的‘摸’论和‘猫’论是我们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当时不应过多地争论，哪个效果好就用哪个。”刘纪鹏和那些早期改革的参与者一道，经历了中国改革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他于1986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多年里主持了像国家电力公司、中国投资银行、海尔集团、天津开发区总公司、李宁公司、四通公司、哈药集团等近300家各类企业的股改、上市及管理咨询方案设计。其中每一个方案都要在选择和观念上与传统势力和观念交锋，这种效率在学者中是极为罕见的。

正因为他与企业的交往，更坚定了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信念，支撑他到现在依然满腔热情参与企业改制和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设计。

“老树发新枝”是一个创造

在众多为企业设计改制的方案中，玉柴的故事最富有戏剧性，所以他被玉柴绑架的故事，就成了刘纪鹏不得不讲的故事。

那是1992年4月，刘纪鹏到中

国工业经济研修中心讲课，下边听课的企业老总们都是正在迫不及待寻找改革路径的人。玉林柴油机总厂厂长王建国也在其中。当时玉林柴油机总厂还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王建国对刘纪鹏讲课的内容一时很难消化，但他意识到股份制是个好东西，有可能让企业走出新的发展路子。便想办法让刘纪鹏到玉林去考察企业，并为企业设计一套股份制改革的方案。

刘纪鹏用了七天时间在玉林埋头设计出了玉柴的改革方案，创造性地采用了“老树发新芽”的办法，让玉柴成功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将玉柴的资产一分为二，成立玉柴集团公司和玉柴股份有限公司。由集团公司以法人身份在原玉柴总厂基础上以募股设立方式成立玉柴股份有限公司，并持有存量资产折成国家股，同时代管从股份公司剥离出来的一些辅业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

这样一来，既符合上市的股份公司产权清晰的规范，又解决了原有国有企业的股份由谁代表和管理的问题。最终使玉柴不仅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成功上市，而且在纽约上市时也得到了国际专家的一致认可。方案通过后，玉柴成为广西首家股份制公司，在全国成功地定向募集企业法人股8000万股，募集股金2.4亿，如数转入玉柴的银行账号。玉柴不仅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在国内实现了法人股上市，之后更是在美国成功上市。

中国的改革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去绘出崭新的蓝图，我们很多的改革都是对于过去成型的制度原则以及构架的创造性改造，这一点正是改革的难度，也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全盘推倒重来的关键之处。

他把中国特色的这种企业改革称为“老树发新芽”，讲到了问题的关键。嫁接、革新、派生这些方法我们在30年的改革中都一一尝试过。中国大多数企业是由改造才进入股份制，要规范就必然纠缠在人员安置、制度风险以及需要时间等等事情上，为了争夺时间不规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用大批企业改造嫁接股份制本身不能不堪称中国改革初期的创举。

勇做中国资本市场探路者

刘纪鹏曾对媒体很认真地解读自己：“我是学者和教授型专家，所以不要叫我‘高人或经济学家’，我喜欢咨询这门职业。和各种各样的企业家探讨企业的产权问题和管理问题，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刘纪鹏还是一家咨询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已经成立了15年，是原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后来的国家主席荣毅仁先生亲自签发批准开办的，也是中国最早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一家专业咨询公司。成立之时，《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等都做了报道。尽管刘纪鹏的志向根本就不在经商，但他为了接触实际，能始终站在改革的前沿，能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著书立说，是他人生的第二步规划，这正是刘纪鹏对“标准”这家咨询公司不离不弃又不做大的真正原因。

刘纪鹏对于在一些重大改革问

题上多次和一些争论，甚至和过去的一些老师和朋友“反睦”，感到有些歉意。这倒不是因为他为自己争什么利益，而是一如既往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坚持正确的原则而已。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勇于和善于“为公弃私，为大弃小”。

他认为：股份制改革最初在政治上的争执非常大，当时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动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真正起步是由国家体改委带动，并由央行和体改委分管，在体制上很不顺。我们认为，应该组建独立的证券监管部门，于是由联办组织，我和李青原、章知方等一起讨论，并由我执笔写了《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报告，提出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该报告发表在《经济日报》（1991年），被联办同志称为《联办宣言》。这在当时就需要冲破银证不分的体制，事实证明这一步对中国的股市发展非常关键。

我们都知，当时的改革一是因为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

因为全球化的压力。在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系列改革中，的确留下了很多体制上的硬伤，也给国内留下了像股权分置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政府监管股市文化等等话题的争论空间。很多多次发生在证券市场上的言论之争，几乎都与刘纪鹏有关。例如，在股权分置改革推进的关键时刻，他发表在媒体上的一篇文章综述，不仅针对当时人们对股权分置改革的种种不解进行解释，而且还对一些偏激的言论给予了回应。他认为，如果真正回头看一看中国股市的18年发展史，就不难解开很多人的心结了。

由此看来，刘纪鹏被淹没在这些话题中，成为口水漩涡的中心人物，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坚持了支持资本市场的渐进改革思路。其实，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不就是在试错中不断前行的吗？在这个问题上，董辅初老先生曾说“有学术之争，无非是非之辩。”依此老先生之言可以多得学者以宽容，因为只要坚持改革，我们就需要更多象刘纪鹏这样的探路者。

■ 本期人物话语



今年面临较大物价压力

谢伏瞻（国家统计局局长）1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指出，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涨价因素，仅仅是去年的物价上涨翘尾影响，2008年我国物价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党中央、国务院把控制物价上涨作为今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一定能收到应有的成效。

■ 多声道

中国仍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经济体之一

史米高博士（德意志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暨全球市场研究部亚洲部主管）日前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肯定会有所放缓。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外出口可能会放缓所致，另外央行所实施的从紧货币政策，包括对房地产行业实施的紧缩投资活动等，再加上对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企业的限制等政策措施，都可能成为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因素。即便如此，中国2008年GDP增长仍然会保持在10.4%左右，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会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即便不是全球最快的，也是最快的几个经济体之一。

中国经济将会经受住美国经济减速考验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1月23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将会经受住美国经济减速的考验。今年中国经济也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首当其冲的是能否有效控制通货膨胀，这需要寻求一个很好的政策结合点，因为动作过大反而会损害经济增长。虽然美国经济减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对对外贸易方面），但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扩大内需弥补缺口，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在出口和国内需求不足的时候，完全可以动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抵消其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很多，因此大可不必过于悲观。

终结美元时代来临

索罗斯（国际著名金融投资家）1月23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2008年年会时呼吁，由于近期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近60年来全球最严重的危机，世界金融领域亟待重新选出一位“新的长官”，而不是一如过去听“华盛顿意志”，因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已经不再情愿积累美元”。同样，金融市场过度的自由已经导致了“非常危机”，如今的境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以美元作为国际流通货币为基础的时代的终结！

世界经济已经与美国经济脱钩

弗莱德·伯格森（美国智库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1月23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指出，世界经济已经与美国经济脱钩。事实上，目前新兴市场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即使美国经济放缓，中国和印度可能会下降1-2个百分点，但全球经济仍可维持在4%的增长，所以绝无进入经济衰退之虞。同时，现阶段正在经历的实际上是“反挂钩”，即美国企业在海外业务的迅猛发展能反过来缓解本国经济下滑的负面影响，而这种“反挂钩”使得美国经济放缓带来的损害变得温和且不会太长。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大学问家朱谦之 点滴经济学贡献

◎ 梁捷

朱谦之先生以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而闻名于世。他写了好几本有影响力的日本学、佛学和景教专著，早年的哲学系学生无人不知他，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年还有《历史学派经济学》、《经济史研究序说》和《中国经济学说纲领》等经济学专著和论文。蔡元培为他写《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序言时，赞扬他“从玄学人科学”，没想到他很快又“由科学人哲学”，而经济系学生却再也没听过他的名字了。

朱谦之先生，字倩庵，福建人，是早年北大哲学系学生。朱在校期间就完成了《周秦诸子学统述》和《太极新图说》等著作，声名赫赫。一方面因为他读书用力，视野广阔，深得图书馆馆长李守常先生器重。李先生感叹说，朱谦之看完了整个图书馆的三分之一藏书，照这样的趋势，看完了可怎么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朱谦之思想激进，锋芒毕露。当时兼职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回忆说，“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朱谦之离开北大以后，曾从太虚和欧阳竟无出家，后又不满佛门生活而“叛出佛门”，四处游历，研究了《革命哲学》、《无元哲学》和《周易哲学》，又放弃哲学，转入历史和科学。在思想和生活上，他不断改变着方向，但在精神上则与北大毕业生、师从郑天挺研究音乐史的杨没紧女士疯狂地相爱了。

他俩都信奉“柏拉图式恋爱”，辞去了工作，结伴居住在杭州西湖葛岭山下。朱谦之称两人的生活是“吟风弄月，傍花随柳，一方面和社会政治隔绝，一方面与爱人默默化”。可是由于生活所迫，朱谦之不得不一次次离开杭州去找工作。朱谦之第三次南下广州时，杨没紧已因身体虚弱而罹患肺病，竟然一病不起，年仅31岁就去世了。

国内大革命失败造成的压抑环境，特别是杨没紧的去世，使得朱谦之万念俱灰。在出版了朱杨两人的情书合集《荷心》之后，朱谦之在一些朋友的资助下于1929年东渡日本，开始追求学问。朱谦之学得极为刻苦，据他自己回忆，他只有两件外套，有时送到洗衣房去了，一天就无法出门，索性没用日夜地发奋用功。这段时间里，他的思想从虚无主义逐渐转向黑格尔和孔德的历史哲学，陆续写下《历史哲学大纲》、《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等著作。而他对于经济学略施关心，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1931年，他回到国内，在上海执鞭国立暨南大学。当时浙江省长张难先与朱谦之相熟，因为省库空虚、经济困难，常来沪找朱谦之商量对策。有一位辛亥革命元老、曾经参加过咨议局的刘冕执在1927年提出实行“能力本位制”，并同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挂钩。所谓能力本位制，即以个人或机关的“能力”为货币的本位，领取相应的“国币代用券”以供使用，取消金钱的货币资格。1932年，刘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华货币革命协进会，出版《货币革命》月刊，宣传自己的主张，得到不少党政要员的支持。

另一派看法则以廖仲恺为代表，提倡“货物本位”。廖主张以十二种货物即金、银、铜、煤、米、麦、豆、糖、盐、丝、棉作为之本位。这些货物并不用于交易媒介，只用于准备，而以关联价格的货币流通于市场，准备上易随需要而为损益。廖的这种设想没有实现，后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经济学家薛暮桥学得去。沪杭地区的民间金融高度发达，一旦施行刘说，势必造成局势混乱。在朱谦之与马寅初的竭力劝阻下，这两种空想学说终于作罢。而这次活动倒也激发了朱谦之对经济学的兴趣，依靠他的历史学功底和经济学视野，开始撰写《历史学派经济学》。

这本书于1931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欣然做序，称朱眼光独到，在经典学派（即今日所谓古典和新古典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争以外别出机杼，演绎中有归纳、归纳中有演绎，比那两派来得更为“进步”。以现在的判断来看，蔡先生的说法并不过分，朱谦之能统摄经济、法学、政治和宗教等多种学科背后的“历史主义”运动，既归纳出黑格尔和孔德哲学是它们的思想基础，又能条分缕析地叙述经济历史学派的脉络，堪称一部难得的巨著。

朱谦之这本《历史学派经济学》，切入十九世纪后期整个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思想环境，由此也可体会朱先生一整套历史哲学乃至人生哲学、宇宙哲学的精神。

朱谦之毕生只写了这样一本经济学专著。此后，他在中山大学主办《现代史学》时，还特意出了一期“经济史研究专号”，在上面发表《经济史研究序说》的长文，算是他与经济学仅有的一点联系了。

■ 美加观潮

推陈出新：海外中餐馆立身之本

◎ 何祖

据说粤菜为八大菜系之首，可分为三：广州菜、潮州菜和客家菜。广东人讲究吃，能把粤菜做到鲜美无比的地步，这跟他们的生活哲学有关。

他们既不像十里洋场的上海人那么领先时尚，又不像天子脚下北京人那样自豪于天下，他们的热情和旨趣往往倾注在餐桌上，你看他们喝茶的劲头就能体会一二。真所谓“躲进酒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海外的中餐馆也主要以粤菜为主，但有些粤菜就不敢恭维了。首先，国外的粤菜基本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也许是当年老华侨带出去的。菜的量非常足，往往一大盘，足够一个圆台面的吃。

其次，为了迎合老外的口味作了些改良，又甜又酸，你想“菠萝鸡”能吃吗？但老外偏偏喜欢点这道菜。再者，没有新菜，菜谱都老掉牙

了，连老外都会说“炒面”、“杂碎”和“宫爆鸡丁”等广东话，好像中国菜就那么几样东西。难怪有的老外来到中国后反说中国本土的中国菜还不正宗呢。

然而，就服务质量来讲，国外中餐馆比目前的中国饭店并不差。广州人称酒楼饭店的服务员女性一律为“靚囡”，男性一律为“靚仔”，而不管其妍媸老少。在国外中餐馆里，靚囡和靚仔很少，但端菜跑堂的不少是打工赚学费的读书人，甚至博士和硕士生。其实道理很简单，味觉也是有阈值的，反复刺激会产生麻木，于是返璞归真成为一种自然现象。记得枚乘的《七发》好像就有一句话：“甘浓肥脆 腐肠之药”。（记不确切了）我们用味精、鸡精和煲汤把我们的味觉搞得大累了，（味觉审美疲劳）是不是也应该让味蕾和肠胃歇一歇，说不定只有这样才能尝到当年皇帝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呢？

受欢迎。有些上海菜馆一到用餐时间，门口往往会排长队。

同时，上海餐馆一般都讲究装修，餐馆装修相对比较较好，有的甚至把“东方明珠塔”也装点在内。而有些粤菜馆味道不错，但卫生条件较差。

大多数老外到中国后，最初很喜欢吃各种中餐。但是，他们不久还是吃回他们的“本帮菜”了。这些西餐在我们看来淡而无味极了。我有个朋友专门种植供他们吃的蔬菜，据说在超市卖得很好，生意也做得越来越大。其实道理很简单，味觉也是有阈值的，反复刺激会产生麻木，于是返璞归真成为一种自然现象。记得枚乘的《七发》好像就有一句话：“甘浓肥脆 腐肠之药”。（记不确切了）我们用味精、鸡精和煲汤把我们的味觉搞得大累了，（味觉审美疲劳）是不是也应该让味蕾和肠胃歇一歇，说不定只有这样才能尝到当年皇帝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呢？